



□朱辉

要论风云人物的出产数量，最近二十多年无疑是最多的。虽然他们大多只是匆匆过客，没几年就淡出人们的视野，被滚滚“后浪”淹没了，可是他们对于普通老百姓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当年的“股神”杨百万。

“我们厂党委书记今年到宿舍区来拜年，居然说‘恭喜发财’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个春节，我所居住的工厂宿舍区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新闻。那个时候，报纸、电视并不能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多少资讯，你的官职高低决定了你获得信息的多少。宿舍区里的人能够接触到的最高干部就是厂党委书记。有句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就是我们全宿舍区居民了解政策冷暖的那只鸭。

将信将疑中，一个个个体户在我们身边相继发了财，过上了天天抽“希尔顿”，餐餐吃“爆京片”的幸福生活。于是，我们彻底相信了国家确实在鼓励我们发家致富。相信归相信，羡慕归羡慕。可是怎样才能发财呢？靠工厂发的百把块钱工资显然是不行的，辞职去干个体户？个体户是没有劳保的，年纪大了没有退休金、没有公费医疗、没有住房分配，尤其后者，在当时的城里你再有钱也买不到房子。有了这些“没有”，除了农民进城、“两劳”释放、待业人员，没有几个城市居民敢砸了铁饭碗去抽“希尔顿”、吃“爆京片”。

等待着，等待着。90年底终于来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风云人物杨百万。与以前的王进喜、陈永贵不同，杨百万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可以去感染人，也不是小时候就跳粪坑救人的“高大全”英雄。他感染人的唯一原因

就是他姓氏后面的“百万”二字，他就是那个时代老百姓眼里的“李嘉诚”、“比尔·盖茨”。

除了百万，另一个使他能成为平民偶像的理由是他的身份只是某单位仓库的前主任，他炒股用的本金也是大多数老百姓拿得出来的。

另外，炒股不必辞职，可以端着铁饭碗炒，这点大大增加了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性。

“和尚动得，我就动不得？”

这是中国老百姓最惯用的类比思维。

杨百万这个“和尚”如此普通，因此他的发财能够激发出来的“动力”可想而知。于是，证券交易所里便挤满了拿着菜篮子的老太太、打着毛衣的少妇、从办公室溜出来看行情的小干部……

沸沸扬扬了几年之后，证券交易所门口卖盒饭、摆报摊的小贩大多发了小财，老太太、少妇之类小股民不是割掉了积累多年的“血汗肉”，就是炒股炒成了“股东”，眼看着理论上的资产一点点变少。

杨百万当然是无罪的，他并没有号召大家跟他学。是老百姓太傻了，明知自己不是那块料还要去送钱？

当初确实是许多专家这样认为，可是现在回头看看，那时候倘若你既想保住自己的“劳保”、“房子”，还想发财，有什么渠道？除了炒股，别无选择。

杨百万随着漫长的熊市渐渐被封存在了中老年人的回忆中，这时一个虚拟的进口理财偶像横空出世，那就是某个按揭买了一套大房子的美国老太太。该老太太除了性别和虚拟的国籍以外，公众对之一无所知。

她是肯塔基人还是加利福尼亚人？年轻时是律师还是清洁工？为什么她一个人还按揭，难道她一直是独身主义者？虽然疑点重重，不过国人一向不喜欢理性思考，习惯了靠“感悟”去领会精神。很快，从

舆论到老百姓，效仿美国老太太，鄙视中国老太太就蔚然成风了。

像股市一样，敢于盲目第一

批进入房市的勇敢者同样收益颇丰。

买房之后，房子和工资都飞快地增长着，要还的按揭还是每月几百、几千块，于是越还越轻松。

当年几万元买的房子不过三、四年工夫就变成了几十万，奔小康的速度快得让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于是，买房成了老百姓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买什么二手房，起码买个1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子。没钱？贷款啊，按照现在的政策即使以后还不上贷款，银行也不能拍卖你的唯一住房，赖着就是了！”

我那没有多少文化的姑妈对于有利于她的政策一向了解得很清楚，并且有用活、用足的打算。

想到她并不高的收入居然按揭了一套高档住宅，银行是凶多吉少。

“我月薪3000，还2000确实

紧张了一些。不过再过几年工资涨到一万多，再还2000多就不吃力了……”这是我朋友小李的观点。

从几百到几千，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年，许多人的工资确实飞跃了。可是就像一个差生的成绩从40分提高到80多分，也许短期补习就能达到。

可是从80多分要提高到100分就不是同样的时间能完成的。

拿这位老兄而言，一家民营企业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一个内地城市月薪要到达一万，估计不是看得得到的未来可以实现的。不过有着小李这样乐观情绪的年轻人并不少，所以舆论再去否定“美国老太太”，去劝年轻人选择租房基本上是徒劳的。

“我觉得当房奴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我的房子一直在涨……现在我不用像没有买房的人那样担心房子涨价了，越涨对我



越有利。”我的一位同事在艰苦还贷之余，痛并快乐着。房价上涨对于只有一套住房的房奴真的有利吗？

他显然没有想过自己的住房如果卖了住到哪里去？如果不卖，理论上的财产增值又有什么意义。假如他以后准备卖房换更大的房子，卖价与当初买价之间固然可以产生“利润”，可是那时的新房子也已经涨了许多，这种“利润”与二次买房需要多支出的房价上涨部分相比，多半还是吃亏了。

与股市相比，房市兴旺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不一样。经过多年改革，大多数人已经告别了铁饭碗，下海经商不再受劳动人事体制的牵制。可是，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投资渠道依然是稀少

的。存银行，利息之低与物价涨幅相比，显然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去搞个体经营，在许多地方没有“关系”根本租不到好店面，接不到具有良好收益的项目，更无法规避过多的苛捐杂税，有数据显示最近五年中国个体户数量大幅减少……比来比去，房市便成了相对透明，可以相对公平参与的投资之路。

“炒股炒成股东，炒房炒成房东”其实并不可笑，杨百万和“美国老太太”也不是让中国老百姓不顾自身情况盲目投资的罪魁祸首。

如果只有一个冷馒头可供选择，那么即使只能吃流食的胃溃疡患者也只能拿起它来啃了，这不是盲目，是别无选择。

最难富贵不能“移”

□海岸

在英国，有一对在快餐店打工的情人，23岁的路克先生和28岁的艾玛小姐，合买了一张彩票，竟然中了一笔130万英镑的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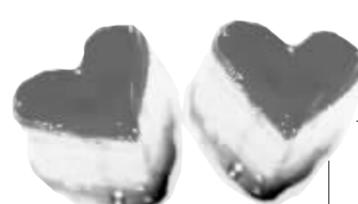
天上飞来的钱，对感情不够坚固的夫妻或情人而言，不一定是福气，反而可能是祸源。

这对情人，应该是一对聪明人吧。他们二人都表示，中奖的感觉真好。不过，他俩的庆祝活动，只不过是各吃一个麦当劳，而且对上门访问的记者说，他们还是会继续在麦当劳打工。

二人虽然未婚，但已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儿。他们齐声说，这个奖是三个人的，他们会好好共享及把握。

不知道这对情人是否研读过心理学。不因中奖而更换工作，是个听来不太有出息但还蛮睿智的选择——人们在短时间内能够应付的变局其实是有限的，经济条件已有巨大改变时，最好不要让生活或工作也一起坐云霄飞车。这样，感情才不会一夜变色。

有人统计过，忽然间中大奖的人，有90%的可能，在三年内生活变得比从前的穷日子更悲惨。有人一年内已花光数百万元，比以前更穷；有



温差变化

□仲利民

我搬进现在住的这幢楼房有三年多了，可是与楼上楼下的邻居相识不多，别人对我熟视无睹，我也懒得与人交流。我成天呆在家里工作，上网浏览资料，按计划写作，用编辑之约撰写稿件，生活过得井然有序。有一天，我去楼下的报箱取信，在楼梯间无意中听到邻居们正在谈论我的无所事事。原来他们把我当作下岗的无业游民了，怪不得遇到我时目光冷漠，表情漠然。

前些天，表姐一家出国经商，一去几年，就把房子租给别人居住，让我把他们家的家具搬过来。我们隔得不远，就自己搬运。表姐一家较为富

裕，生活设施引领潮流，

64英寸的液晶彩电，笔记本电脑，豪华的音响，在我们一件件地向楼上搬的过程中，吸引了众邻居羡慕的目光。有人答讪着问：“刚买的啊？”我不想作出太多解释，以免多费口舌，就点头算是默认了。

在我们不停的搬运过程中，一些从未讲过话的邻居也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脸上堆满了笑容。我感到自己正成了这幢楼里众人目光聚集的焦点，几年来的冷漠在一瞬间消散。傍晚，就在我们调试音响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几位警察站在门外，看到堆满客厅的家电，满腹狐疑地盯着我们，那样子仿佛是在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公事公办的警察下面的问话还真应验

了我的猜想。

“请问，这些东西都是你们购买的吗？”一位略胖的警察开门见山地问。

“是啊。”这话脱口而出，我转而一想，不对，“是亲戚家的。”

“有发票吗？”那位胖警察继续盘问。

“有啊。”幸亏表姐一再叮嘱我把发票收好，没想到此时派上了用场。

那位胖警察认真地查验了发票后，咱地给我们来了个敬礼，然后脸上表情缓和下来，略带笑容向我们解释说：“有人举报你们购买非正常渠道产品，所以打扰了。”我眼前晃过那些表情复杂的面孔。冷漠一惊，羡慕一妒，忌一怀疑一举报，一系列表情迅速在我脑海里镜头似地闪过。

现在我们外出，可以开着表姐留给我们的轿车，那些曾经陌生的面孔挤满了羡慕的笑容，经常听到他们莫名其妙的羡慕声，上楼下楼时“熟悉”的人也多了起来，那些笑容开满了我们相遇的空间，这炎热的季节居然不可思议地提前来临了。

几年后，如果表姐一家回来，从我们手里搬去这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觉得一切正常，但是，身边漾满的那些羡慕与热情就会遭遇强冷空气，瞬间降温了吧？



一万元

有一次，我带着儿子去奶奶家，儿子在他奶奶家发现了几分硬币，现在一分的硬币都好少，所以儿子见了一分硬币感觉很新鲜。奶奶对我儿子说：“你喜欢就拿几个吧。”儿子拿了五个，我对儿子说：“好好保存着，等你当了爷爷，这五分钱说不定就值一万元呢！”

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儿子突然一声惊呼：“爸爸，我的一万元不见了！”满车的人顿时吃惊地看着我儿子。

■笑话

■财富漫谈

鱼和熊掌焉能兼得

□张晓晖

最近文坛多事，某国家一级作家遭恶搞，某作家又是乞讨又是抗议，某副教授给大家看家庭财务报表。众说纷纭，公婆都有理。但实际上，还是一个文艺家对自我的认知、对财富的认知问题（之所以用“文艺家”这个拗口的称谓，是想囊括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等“文艺工作者”）。把财富看明白了，把自己看明白了，也就心平气和，愤懑全消了。咱先说说诗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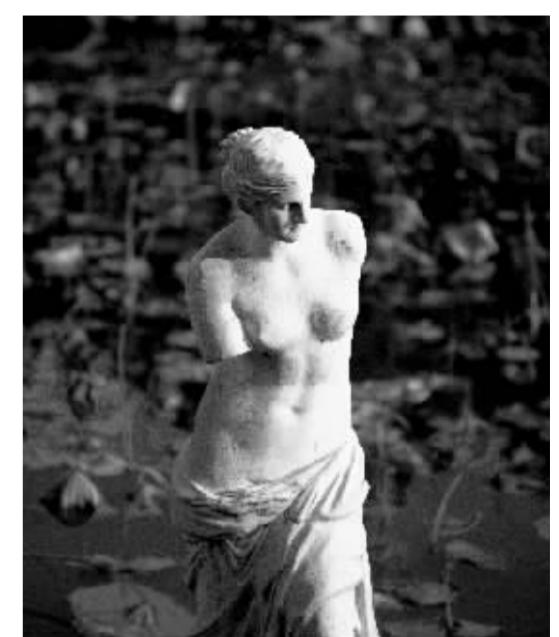
古时候的诗人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身份，诗词广传，名闻遐迩，诗人也就成了名。多数诗人都要自谋生计，做官、写文章，自己养活自己。比如李白曾任翰林学士，这个官是给皇帝起草文件的，相当于高级文秘；杜甫曾任工部检校员外郎，大概相当于建设部的一位副局级巡视员，所以人称“杜工部”；贺知章、辛弃疾、陆游、晏殊都是做官的，而且都是部级高官；不做官，就要靠写文章，韩愈就常给别人写墓志铭，说些捧死人骨头的肉麻话，换几个钱花。即使如近代诗人闻一多、徐志摩，也是靠教书为生，闻一多还兼治印，但都不靠写诗糊口。

如果不能做官，诗人就比较穷。比如，唐朝的“郊寒岛瘦”，写“慈母手中线”的孟郊和写“敲骨吸髓”的贾岛都很窘迫，即使是做过官的杜甫，一旦丢了官，生活水平也就下降了，所以他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知道杜甫没多少钱。学而优则仕，仕途有钱途，如果不能做官，日子就不好过，即使如李白，前后两任妻子都是宰相的千金，李白也不富裕，“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还是离不开典当行。

当代文学家还是有一些能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比如李敖、王朔，除了稿费标准较高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李敖不仅是大作家而且是大坐牢家，王朔、海岩等则除了码字儿出畅销书外，还涉足影视。过去文艺形式单一，文学几乎是在文化荒漠上很稀有的一眼清泉，所以文学家就值钱，看看文革中人们近乎疯狂地借小说、抄小说，就知道了。而随着文艺形式的多样化，比如电影、电视、网络的出现，财富当然也就为多种形式所分流了。当然，如果作品受市场欢迎，仍然可能发大财，比如写《哈利波特》的那位女士，可谓一字千金。

如果自己谋生的能力差，就要依附于某人或某集团，欧洲的富豪往往资助一些作家、音乐家、画家、雕塑家，并举办一些沙龙，高朋满座，高谈阔论，高雅艺术。

但对于文艺家来说，你要弄出你自己的东西，就要过独立的日子，不能为人豢养。舒伯特的《摇篮曲》只换了一份烧土豆，穷得他39岁便英年早逝，而那份乐谱手稿若干年后却拍卖了四万英镑；冼星海放弃了国统区的高薪，奔赴生活艰苦的延安。在延安写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一民族的最强音。



再回头看诗人，诗人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身份，也就是大家认可。比如，当年的北岛、舒婷、顾城，没有谁授予他们“国家一级诗人”的称号，但他们的诗深得人们的喜爱。可笑的是现在，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的“国家一级”，如演员、诗人，听起来似乎是“国家层次上的一级”。这就很怪了，有没有“国家一级教授”、“国家一级保育员”、“国家一级护士”？难道演员、诗人是国家的，护士、保育员就不是国家的？如果自己低调些，日子就好过得多。比如郭德刚，口口声声“咱就是个说相声的，没什么大能耐”，“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到天桥乐没别的，就是给的多”（多次返场），谁还能跟他过不去？

说起来，大家伙儿都要活着，都要衣食住行，要赚钱，要兼职，要走穴，都很正常，没必要把自己的财物报表说得地球人都知道。副教授四千块的收入再少，比下岗职工多吧？赚钱就赚钱，谁不爱钱呢？谁不要过日子呢？只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所以，如果当作家不赚钱，干脆什么赚钱干什么去，不当专职作家也可以，高尓基穷不穷？谋生、流浪、备受欺辱，看看《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都是眼泪，可老高不是写出了不少鸿篇巨著么？

如果一心当作家，或者干诗人，确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就认命，甘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努力写出一部《荷马史诗》来。

市场化的今天，经济大潮把很多东西冲击得面目全非，文艺家很难再找到一个利益集团的资助，哪怕是一个沙龙——这个待遇已经被经济学家夺走了。文艺家们或者走向市场，争取做个物质贵族；或者走向灵魂，争取做个精神贵族。中国的文艺家有几个像阿炳那样；一个卖唱的盲人，却为人间留下了千古绝响《二泉映月》。

一切痛苦都来自在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之间的徘徊——本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定要兼得，痛苦自然免不了。